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哈喇浩特（黑城）採集的元代景德鎮和龍泉窯瓷片



哈喇浩特採集元代青花玉壺春瓶頸部殘片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謝明良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古今論衡　第 39 期　2022.12

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五年，由瑞典斯文・赫定（Sven Hedin）博士所率領的瑞典和中國名爲「西北科學考察團」的聯合團隊，對於中國西北的考察活動和獲得的諸多成果，至今仍常爲學界所提及。依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典藏編號可知，由「西北科學考察團」得自內蒙古額濟納河流域遺址的陶瓷標本總數計 60 件（片）。其中，白釉紅綠彩和鈞窯青瓷等中國北方諸窯標本另有學者擔綱，本人受託調查的對象是中國南方系瓷窯標本，此包括：江西省景德鎮窯（青花瓷 8 片，單色釉 3 片）以及浙江省龍泉窯（青釉 5 片）。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原始檔案另顯示，上述南方系瓷窯標本大多採集自哈喇浩特，即蒙語 Khara-khoto，意爲黑色之城，也稱黑城或黑水城，其遺址在今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盟額濟納旗達來呼布鎮東南二十餘公里的巴丹吉林沙漠邊緣，南臨額濟納河下游已乾涸的河床。

以下，擬結合瑞典弗克・貝格曼（Folke Bergman, 1902-1946）所撰寫在甘肅金塔和內蒙古額濟納河流域的考察報告，也就是一九五〇年代由瑞典東方博物館博・索馬斯特勒姆（Bo Sommarström）博士整理出版，❶並在二〇一四年中譯的《內蒙古額濟納河流域考古報告：〔瑞典〕斯文・赫定博士率領的中瑞聯合科學考查團中國西北諸省科學考察報告考古類第 8 和第 9》，❷針對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標本做一介紹。在此應該一提的是，上引《內蒙古額濟納河流域考古報告》並未涉及現藏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標本，這也就是說，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這批陶瓷標本除了少數幾件曾展示陳列於該所文物陳列館展廳，其餘多數標本未曾公諸於世。就此而言，八十年前由「西北科學考察團」採集自哈喇浩特（黑城）現藏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這批陶瓷標本，也可算是另類的新資料吧。

一、景德鎮窯

（一）青花瓷

一九五〇年代，J. A. Pope 依據英國大維德基金會（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藏帶有元代至正十一年（1351）青花象耳龍紋瓶，結合伊朗阿德比爾聖寺（Ardebil Shrine）和土耳其炮門宮殿博物館（Topkapi Saray Museum）藏同類型青瓷，提出所謂至正型青花瓷以來，❸學界對於元代青花瓷的樣式特徵已有基本的共識，黑

❶ Bo Sommarström,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the Edsen-gol Region, Inner Mongolia* (Stockholm: Statens Etnografiska Museum, 1956, 1958).

❷ 博・索馬斯特勒姆（Bo Sommarström）著，黃曉宏等譯，《內蒙古額濟納河流域考古報告：〔瑞典〕斯文・赫定博士率領的中瑞聯合科學考查團中國西北諸省科學考察報告考古類第 8 和第 9》（北京：學苑出版社，2014）。

❸ J. A. Pope, *Chinese Porcelains from the Ardebil Shrine* (Washington: Freer Gallery of Art, 1956; Reprinted 1981); *Fourteenth-Century Blue-and-White: A Group of Chinese Porcelains in the Topkapu Sarayi Müzesi, Istanbul* (Washington: Freer Gallery of Art, 1952).

城所採集青花瓷的產地和年代判斷，即是基於 J. A. Pope 的先驅研究以及之後以中國考古發掘資料爲主所進行的年代和產地釐定。❹

從研究史看來，在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經報導的自哈喇浩特採集或發掘得到元代青花瓷的案例，計有：俄國科茲洛夫（P. K. Kozlov）隊（1908、1909、1926 年等三次）、英國斯坦因（Aurel Stein）隊（1917 年）、美國華爾納（Langdon Warner）等哈佛大學隊（1923 年），以及以斯文・赫定、徐炳昶爲首的瑞中聯合西北科學考察團（1931 年）。❺其中，科茲洛夫所獲 1536 件陶瓷標本現藏聖彼得堡冬宮，即國立艾爾米塔什博物館（Hermitage Museum），包括青花瓷 493 片，釉裏紅瓷 1 片；❻斯坦因採集品現藏大英博物館，含蓮塘水禽紋碗在內青花瓷殘片共 6 片；❼瑞中西北科學考察團所獲標本分別歸屬瑞典和中國，前者現藏瑞典斯德哥爾摩民族學博物館（Etnografiska Museet），青花瓷計 120 片，❽後者歸屬中國的標本是否全數運送來臺？現今已難查證，但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57 件哈喇浩特採集標本當中，包括 7 片青花瓷。試介紹如下：

標本 1（典藏號 H14460，簡號 476.037）長 3cm，寬 1.5cm。（圖 1）

器表青花繪蓮荷花葉紋，裏面無釉，可見清楚的水平轆轤拉坯痕，據此可知應屬瓶罐類器身部位殘片。類似的蓮荷花葉見於江西省上饒市博物館藏元青花玉壺春瓶身腹部位（圖 2），印尼東爪哇 Mojokerto 州 Trowulan 也曾採集到同類器身殘片（圖 3），採集地點被認爲是元代汪大淵《島夷志略》所載爪哇國都城「門遮把逸山」宮室所在範圍。❾

❹ 在此必須向故龜井明德教授致上敬意，因爲他和他的團隊彙整了中國、古琉球、日本和印尼等地出土或採集得到的大量元樣式青花瓷標本，並且做了專業的測繪。參見：同氏等編，〈中国出土の元青花瓷資料集成〉（001-068），《亞州古陶瓷研究》II（2005）：1-128；〈日本出土の元青花瓷資料集成〉，《亞州古陶瓷研究》III（2008）：1-304（以上二文後又收入《元代青花白瓷研究》〔川崎：亞州古陶瓷學會，2009〕）；以及印尼 Trowulan 採集標本見：專修大学アジア考古学チーム編，《インドネシア・トローラン遺跡発見陶瓷の研究—シンガポール大学東南アジア研究室保管資料—》（川崎：專修大学アジア考古学チーム，2010），頁 1-520。

❺ 十九世紀末以來各國探險隊對於黑水城的調查簡介，參見：岡崎敬，〈西夏カラホト古城と元青花について〉，原載《シルクロード》3，後收入氏著，《中国の考古学 隋唐篇》（京都：同朋社，1987），頁 262-281。

❻ Evgeny Lubo-Lesnichenko, “The Blue-and-White Porcelain of Yuan Period from Khara-Khoto,” 收入《中國古代貿易瓷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94），頁 462-483；弓場紀知，〈エルミタージュ美術館所藏のコズロフコレクション—カラ・ホト城出土の中国陶磁器を中心に—〉，《京都橘女子大學研究紀要》31（2005）：109-156；李仲謀，〈談黑水城遺址發現的元代青花瓷器〉，《中國古陶瓷研究》第 15 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頁 549-575。

❼ Aurel Stein, *Innermost Asia* (1981), pl. LI, LVII. 此轉引自龜井明德等，〈中国出土の元青花瓷資料集成〉，頁 15。

❽ 博・索馬斯特勒姆（Bo Sommarström）著，黃曉宏等譯，《內蒙古額濟納河流域考古報告》，圖版 25 之 18~19；圖版 27 之 1~12；圖版 28 之 1~18；圖版 29 之 1~24。J. A. Pope, *Chinese Porcelains from the Ardebil Shrine* (Washington: Freer Gallery of Art, 1956), pls. 133-134.

❾ 繭山康彥，〈マジヤパヒト王都城出土の元代青花磁片〉，收入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元の染付展——14 世紀の景德鎮窯》（大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1985），頁 26，圖 18, 23, 25, 28。專修大学アジア考古学チーム編，《インドネシア・トローラン遺跡発見陶瓷の研究—シンガポール大学東南アジア研究室保管資料—》，頁 27。

標本 2（典藏號 H14532，簡號 475.012）長 5cm，寬 4cm。（圖 4）

從器形看來，屬平底盤的底部和盤壁部位殘件。盤內底盤壁下方飾弦紋二周，內區三條沒骨條紋，比較現在其他之青花標本，其中兩條並排的條紋後端呈勾卷形，應該是鳳鳥尾部殘片（圖 5）。其次，勾卷形鳳鳥尾左方所見一道呈「U」形的雲腳飾則是常見於元青花朵雲或火珠、龍、異獸軀體上的焰紋（圖 6）。弦紋上方盤壁部位飾間隔仰式變形蓮瓣，蓮瓣內繪花葉；前引甘肅臨洮縣出土的鳳紋匜則是在外壁飾變形蓮瓣（同圖 5）。外器壁施釉不到底，上方可見青花弦紋一周，器壁可見尺寸均一的間隔凸稜將器壁區分爲幾個單位，可與盤內壁的青花變形仰蓮瓣相呼應。平底、露胎，從平坦的器底和盤壁規則分布的凸稜可知，屬模製成型的多方平底盤殘片。

標本 3（典藏號 H14546，簡號 476.036）長 4cm，寬 2.5cm。（圖 7）

從殘片看來，屬瓶罐類的口頸部位殘件。口沿子口有釉，器表以兩道弦紋區隔，下方飾六瓣形花，上方飾卷草紋，卷草紋上下另飾弦紋一周。內壁除口沿部位之外，餘不施釉。前引東爪哇 Trowulan 曾採集到口沿飾卷草紋，弦紋以下飾六瓣花葉的元青花盤口罐（圖 8），其繪飾構思可做爲「標本 3」原器形不明瓶罐破片裝飾布局的參考。

標本 4（典藏號 H14534，簡號 475.016）長 5cm，寬 3.5cm。（圖 9）

標本中段束腰，上下弧形外敞。由於標本器形和紋樣特徵明顯，所以可以輕易地辨識出應屬所謂玉壺春瓶的口頸部位殘件：中段飾四瓣式球紋，球紋上方以兩道弦紋爲間隔，以上飾蕉葉紋，球紋下方同樣以複式弦紋爲界，以下飾俯式變形蓮瓣。類似的作品存世不少，如日本出光美術館藏人物鹿紋瓶即爲一例（圖 10）。另外，標本蕉葉及變形蓮瓣部位可見四處小鑽孔，推測是以釘鋦補修時所留下的鋦孔，此容後再述。

標本 5（典藏號 H14340，簡號 475.014）長 3.5cm，寬 2cm。（圖 11）

表飾青花花葉，葉及莖側邊留白，花葉的側留白是元青花常用的繪飾技法，如「標本 1」（同圖 1）或中國江蘇省南京市宋晟夫人葉氏墓出土的蓮池鴛鴦碗（圖 12）等均爲其例。裏不施釉，可見明顯轆轤拉坯痕以及一道胎接補強的泥條。葉紋旁有一透體的鋦孔。

標本 6（典藏號 H14535，簡號 475.017）長 4.5cm，寬 3.2cm。（圖 13）

器表以青花弦紋二道爲界，上飾花葉，下飾俯式變形蓮瓣，蓮瓣內另繪雲卷式花，旁可見一鋦孔；各瓣之間另填以複線瓣尖。從變形蓮瓣下方反折且未施釉的器式特徵看來，標本屬底不施釉的青花瓶罐下方近底部殘片。類似的作品見於菲律賓出土品（圖 14）；東爪哇 Trowulan 也見不少瓶身下部繪飾俯式變形蓮瓣的元青花瓷標本（圖 15）。

標本 7（典藏號 H14533，簡號 475.013）長 3cm，寬 2.8cm。（圖 16）

表飾青花，裏不施釉。從裏面可見轆轤漩紋及泥條接痕等看來，應是瓶罐類的器身殘片。由於瓶罐類多採用分段成形而後再接合的製作方式，因此在內腔留有接合補強的泥條。雖然表飾青花連續卷紋的紋樣常見於元青花花菓或葡萄藤蔓，但也見於明初十五世紀及之後景德鎮青花瓷，因此光是從標本青花藤蔓局部線條實在很難予以年代區分。不過，相對於明初瓶罐內壁一般多施釉，本標本內壁無釉，且呈米糊澀胎，看來有較大可能屬元代製品。土耳其炮門宮殿博物館收藏有繪飾瓜果、葡萄藤蔓的元代景德鎮窯八方葫蘆式瓶（圖 17）。

除了以上七件哈喇浩特採集的元青花瓷標本之外，歷史語言研究所另收藏了一件同樣是由瑞中西北科學考察團得自額濟納河流域博羅松治遺址（P9）的青花瓷片，該遺址正是發現第一枚漢簡之處，也是一連串烽燧中最東邊的所在地。在此暫列爲「標本 8」，一併介紹如下：

標本 8（典藏號 H14149，簡號 342.001）長 4cm，寬 4.5cm。（圖 18）

表飾青花龍紋，裏面無釉，有明顯轆轤拉坯痕跡。從龍紋的繪飾作風結合殘留部位的器形特徵，可以很容易地識別出應是所謂玉壺春瓶的身部位殘件。類似的繪飾龍紋的玉壺春瓶存世不少，如安徽省蕪湖縣出土例（圖 19）。現藏瑞典斯德哥爾摩民族學博物館（Etnografiska Museet）由弗克・貝格曼（Folke Bergman）採集自哈喇浩特的元青花標本中也可見到繪有龍紋的瓶腹部位殘件（圖 20），其龍身均是在線繪的邊廓中繪網格鱗片飾。

（二）單色釉

標本 9（典藏號 H14411，簡號 476.041）長 5cm，寬 3cm。（圖 21）

以氧化鈷爲著色劑的俗稱鈷藍釉製品。從標本器式看來，應該是杯盞口沿部位殘片，口沿下方盞身部位有一銅孔。口沿帶釉，以下微外弧後內斂，參酌存世的元代杯盞器式，不排除有可能是所謂靶盞即高足盃的口沿部位殘片（圖 22）。波斯人稱青金石（Lapis lazuli）爲 Lājevard，並將主要施罩鈷藍釉或於鈷藍釉上飾金彩的瓷器名爲 Lajvardina，意謂以青金石所製成的寶貨。⑩

標本 10（典藏號 H14543，簡號 476.028）長 5cm，寬 5.5cm。（圖 23）

爲底足至器下腹殘片，除底足之外，整體施罩淡青釉。圈足，圈足著地處較寬，內足牆漩修出斜面，足心留下俗稱肚臍眼的突起。器腹平折收斂至足部，呈所謂的折

⑩ 考古美術班（水野清一等），〈第四、第五次イラン・アフガニスタン・パキスタン學術調查豫報〉，《東方學報》（京都）37（1966）：403, 409。另外，杉山正明，在《大モンゴルの世界：陸と海の巨大帝國》一書援引漢文和波斯語雙語史料《回回館譯語》指出，波斯語稱青花瓷（或者也包括其他瓷器在內）爲「Lajvardina」，意爲「Lapis lazuli」製（東京：角川書店，1992，頁 293）。

腰盤式。明初曹昭《格古要論》載江西饒州府浮梁縣，即今景德鎮燒造有「素折腰樣」的白瓷，其中「元朝燒小足印花者內有樞府字者高」（古饒器條）。這類內壁帶「樞府」字銘的印花折腰盤於景德鎮湖田窯出土標本經常可見（圖 24），韓國新安木浦發現元代至治三年（1323）著名的新安沉船中也可見到同類製品。元代折腰盤釉色和裝飾種類不一，除了有卵白釉、白釉或青花瓷之外，也包括「標本 10」般施罩淡青色釉等製品。

標本 11（典藏號 H14542，簡號 476.027）（圖 25）

底至圈足部位殘片。胎質堅緻，施淡青色釉，從器身近圈足處平折內收的器形特徵，可知標本亦屬折腰盤的殘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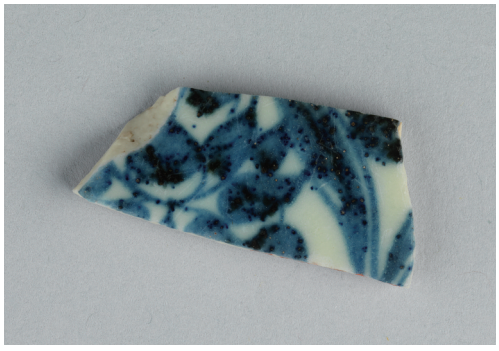


圖 1a：哈喇浩特採集元代青花殘片，3×1.5cm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圖 1b：同上，內面



圖 2：元青花蓮池玉壺春瓶，H 26.7cm
中國江西省上饒市博物館藏



圖 3：東爪哇 Trowulan 採集元代青花殘片
國立新加坡大學東南亞研究室藏



圖 4a：哈喇浩特採集元代青花殘片，5×4cm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圖 4b：同上，外底



圖 5a：元青花鳳紋匜，D 13.2cm
中國甘肅省臨洮縣出土



圖 5b：同上，側面



圖 6：元青花龍紋扁壺，H 38.9cm
日本出光美術館藏



圖 7a：哈喇浩特採集元代青花殘片，4×2.5cm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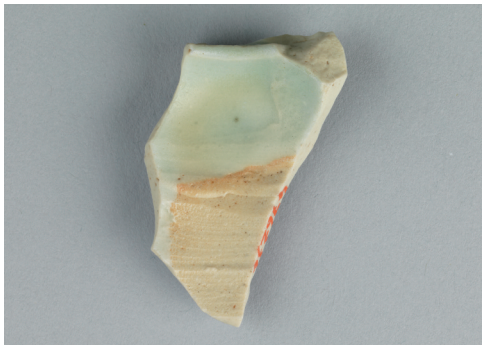


圖 7b：同上，內面



圖 8：東爪哇 Trowulan 採集元代青花殘片
國立新加坡大學東南亞研究室藏



圖 9a：哈喇浩特採集元代青花玉壺春瓶頸部殘片
5×3.5cm，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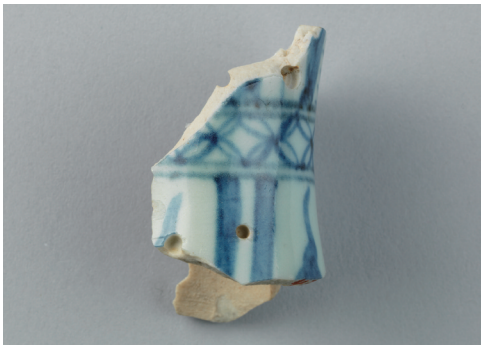


圖 9b：同上，背面



圖 9c：同上，內面



圖 10：元青花人物玉壺春瓶，H 30.5cm
日本出光美術館藏



圖 11a：哈喇浩特採集元代青花殘片，3.5×2cm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圖 11b：同上，內面



圖 12：元青花蓮池鴛鴦碗（局部），D 30.1cm
中國江蘇省南京市宋晟夫人葉氏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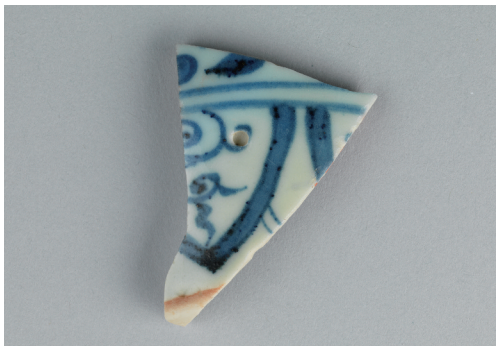


圖 13a：哈喇浩特採集元代青花殘片，4.5×3.2cm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圖 13b：同上，內面



圖 14：菲律賓出土元青花小罐
左 H 10cm，右 H 8.7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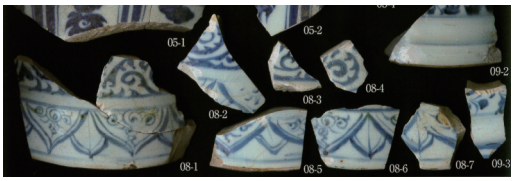


圖 15：東爪哇 Trowulan 採集元代青花殘片
國立新加坡大學東南亞研究室藏



圖 16a：哈喇浩特採集元代青花殘片，3×2.8cm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圖 16b：同上，內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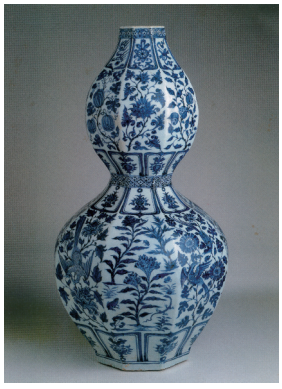


圖 17a：元青花八方葫蘆式瓶，H 60.5cm
土耳其炮門宮殿博物館藏



圖 17b：同上，局部



圖 18a：額濟納河流域博羅松治遺址（P9）採集
4×4.5cm，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圖 18b：同上，內面



圖 19：元青花龍紋玉壺春瓶，H 24.5cm
中國安徽省蕪湖縣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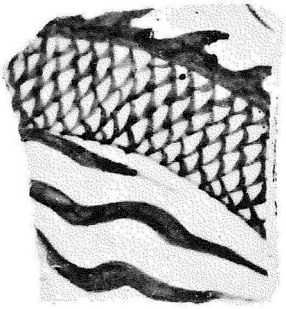


圖 20：哈喇浩特採集元代青花殘片
瑞典斯德哥爾摩民族學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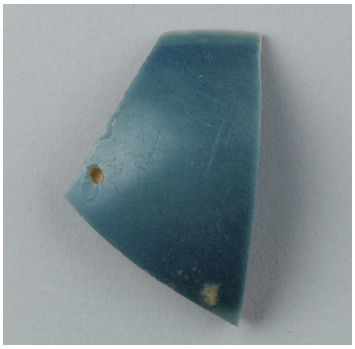


圖 21a：哈喇浩特採集元代鈷藍釉殘片
5×3cm，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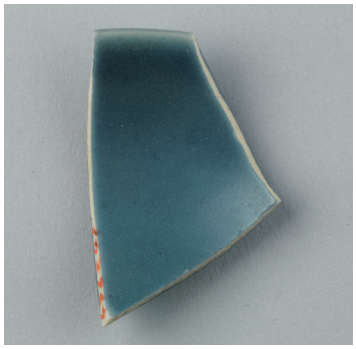


圖 21b：同上，內面



圖 22：元代印白釉高足杯，H 10cm
中國江西省景德鎮窯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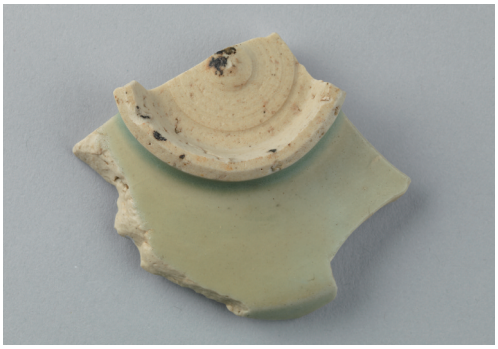


圖 23a：哈喇浩特採集元代淡青釉殘片，5×5.5cm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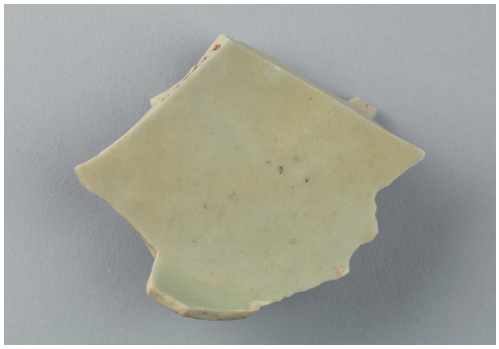


圖 23b：同上，內面



圖 24：元代「樞府」銘印白釉印花折腰盤
D 12cm，中國江西省景德鎮窯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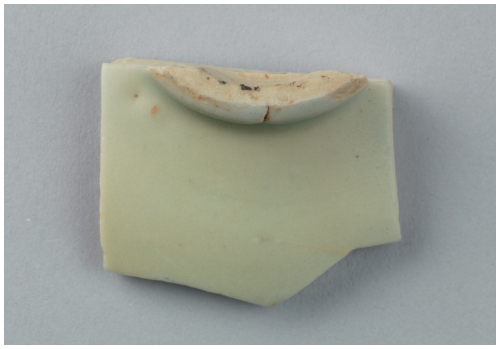


圖 25a：哈喇浩特採集元代淡青釉殘片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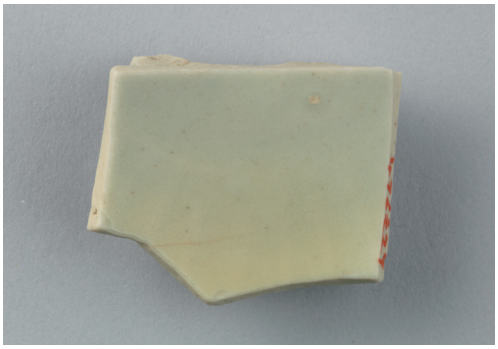


圖 25b：同上，內面



圖 25c：同上，內面

二、龍泉窯

標本 12（典藏號 H14529，簡號 475.007）長 3.7cm，寬 3.5cm。（圖 26）

僅存造型略呈喇叭式口的高足下方部位。著地處足外牆切削成斜面，足身旋出數道弦紋，足內錐形挖空至外足弦紋處，除了足著地處和足內腔之外，整體施釉調偏暗的青釉。類似的元代龍泉窯青瓷高足杯存世不少，其中安徽省安慶市出土的竹節式高足杯（圖 27），從釉色到切削成斜面的足牆都和「標本 12」相似，其既可做爲標本原型的參考，也明示了標本足部的弦紋乃是表現竹節。今日以造型來命名稱呼的高足杯是元代常見的器式，東北亞朝鮮半島和日本區域的人將之稱爲馬上杯，元刊本《事林廣記》或明初《格古要論》則作「靶盞」，是當時時尚的飲酒道具，也可裝盛蔬果用於儀禮等正式場合。⓫

標本 13（典藏號 H14339，簡號 475.009）長 6cm，寬 3cm。（圖 28）

內外施青釉，外壁刻劃蓮瓣飾，另見銅孔一處，從器形特徵看來，可以辨識出是南宋至元代常見的蓮瓣紋碗，相對於南宋朝的蓮瓣瓣幅較寬，本標本所見蓮瓣飾相對地窄，具有典型的元代作風。類似的作例可參見前引韓國新安木浦元代至治三年（1323）新安沉船打撈品（圖 29）。

標本 14（典藏號 H14540，簡號 476.021）長 3.5cm，寬 3.5cm。（圖 30）

從器形看來，屬盤碟類的殘片。內底青釉下飾印花蓮花，盤壁以外底無釉，留下幾道同心圓轆轤旋坯痕。韓國新安沉船可見不少類似的龍泉窯印花盤（圖 31）。龍泉窯窯區的複數瓷窯都曾燒造此類印花飾器皿，如大窯楓洞岩窯址即爲一例（圖 32）。

標本 15（典藏號 H14539，簡號 476.020）長 5cm，寬 3.5cm。（圖 33）

僅存碗類近底足部位以及著地處已缺損的一小段寬圈足。質堅硬，胎色灰暗，有可能是用摻合了紫金土的胎料，青釉呈色相對較暗。外壁近底足處有一銅孔。新安沉船可見類似圈足的龍泉窯青瓷碗（圖 34）。

標本 16（典藏號 H14530，簡號 475.010）長 8.7cm，寬 4cm。（圖 35）

爲碗口沿部位殘片。口沿外翻，內外均施青釉，外壁近口沿處旋修出五道弦紋，最上方弦紋一側有一銅孔。於碗外壁近口沿處飾數道成組弦紋，是元代龍泉窯青瓷常見的裝飾手法，類例不勝枚舉，除了前已多次引用的十四世紀前期新安船遺物之外（如圖 34），一九八〇年代發現的江西省高安縣江西第二電機廠窖藏也可見到（圖

⓫ 劉新園，高喜美譯，〈永樂前期官窯の白磁研究—永樂・宣德官窯考證 その一—〉，《東洋陶磁》15/16（1985, 86-88）：165-166。

36）。其次，以上介紹的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哈喇浩特龍泉窯標本中的標本 12（高足杯，同圖 26）、13（蓮瓣紋碗，同圖 28）、14（印花盤，同圖 30）、16（弦紋碗，同圖 35）於高安窖藏都可見到。高安窖藏不僅可見龍泉窯青瓷，也共伴了景德鎮青花瓷梅瓶、高足杯，以及少數的北方系鈞窯和以銅爲呈色劑的翡翠藍鹼性釉。此一瓷窯共伴種類又和哈喇浩特（黑城，Khara-khoto）、哈喇和林（Kharkhorum）、敖倫蘇木（Olon Süme）等蒙元帝國遺址出土陶瓷組合相近，值得予以留意。



圖 26a：哈喇浩特採集元代龍泉窯青瓷杯足殘件，3.7×3.5cm，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圖 26b：同上，內面



圖 26c：同上，底部



圖 27：元代龍泉窯青瓷高足杯，H 10.5cm
中國安徽省安慶市出土



圖 28a：哈喇浩特採集元代龍泉窯青瓷蓮瓣碗殘片 6×3cm，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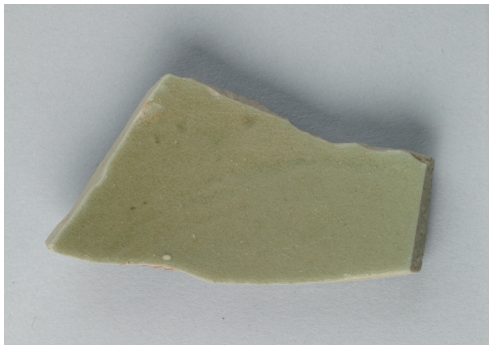


圖 28b：同上，內面



圖 29：元代龍泉窯青瓷蓮瓣碗，D 21.2cm
韓國新安沉船打撈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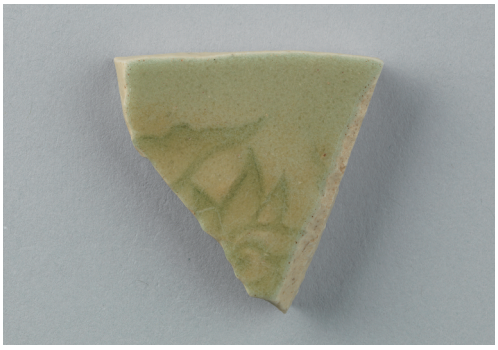


圖 30a：哈喇浩特採集元代龍泉窯青瓷印花紋殘片
3.5×3.5cm，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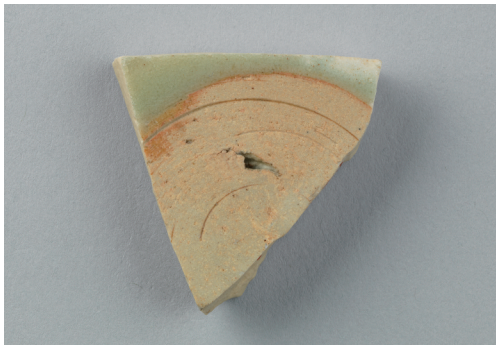


圖 30b：同上，外底



圖 31：元代龍泉窯青瓷印花盤，D 12.5cm
韓國新安沉船打撈品



圖 32：元代龍泉窯青瓷印花殘片
中國浙江省龍泉大窯楓洞岩窯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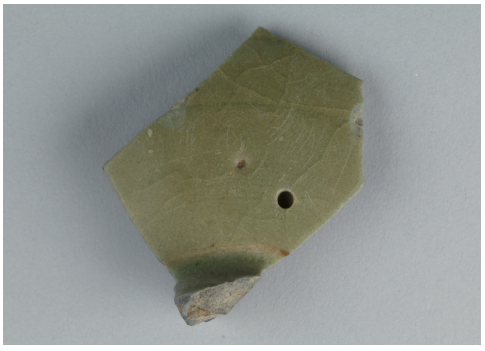


圖 33a：哈喇浩特採集元代龍泉窯青瓷殘片
5×3.5cm，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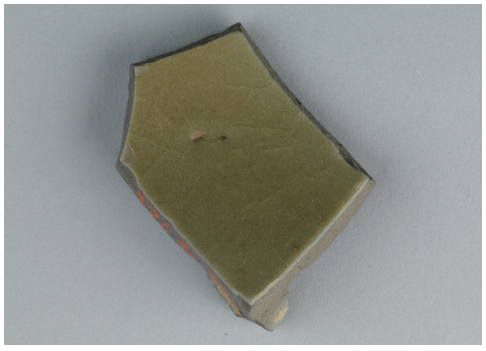


圖 33b：同上，內面



圖 34：元代龍泉窯青瓷唐草紋碗，D 16.5cm
韓國新安沉船打撈品



圖 35a：哈喇浩特採集元代龍泉窯青瓷殘片
8.7×4cm，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圖 35b：同上，內面



圖 36：元代龍泉窯青瓷碗，D 16.9cm
中國江西省高安縣窖藏出土

結語

以上，本文對歷史語言研究所藏瑞中西北科學考察團採集自額濟納河流域遺址的元代景德鎮和龍泉窯標本做了介紹。依據典藏單位的編號，可知除了標本 8（圖 18）青花龍紋殘片是得自博羅松治遺址（P9），其餘均獲自哈喇浩特城（圖 37）。弗克・貝格曼（Folke Bergman）曾依據斯坦因（Aurel Stein）收入在《亞洲腹地》（*Innermost Asia*）的哈喇浩特城內平面圖，增補調查資料後圖繪了新平面圖（圖 38），但報告書並未載明陶瓷標本的具體出土位置。不過，比瑞中西北科學考察團更早赴哈喇浩特城調查的俄國科茲洛夫（P. K. Kozlov）隊，自城內所獲得多達一千五百餘件的陶瓷標本，則出自其所圖繪的商店街址和遺跡 1、2、4，以及西北方中國衙門遺跡（圖 39），後者衙門位置相當於貝格曼平面圖標示的 C 地點，正是他所稱的衙門遺跡。黑城遺址爲早、晚兩座城址疊壓一起，其外圍大城是元代所擴建的亦集乃路故城，小城被圈在大城內東北隅，一九八〇年代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曾對小城開探方數處，其中位置在科茲洛夫所標示遺跡 1 和商店街址之間的 4 號探方（T4）出土了龍泉窯、鈞窯和元青花瓷標本；[12] 大城西南角 4 號院（Y4）的八角佛塔腹內則發現了西夏文書（圖 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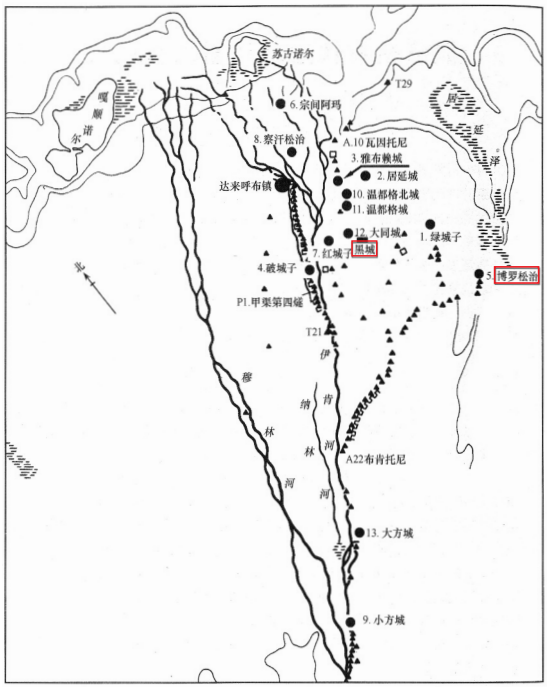


圖 37：額濟納河流域古代遺址分布圖

[12]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郭治中等），〈內蒙古黑城考古發掘紀要〉，《文物》1987.7：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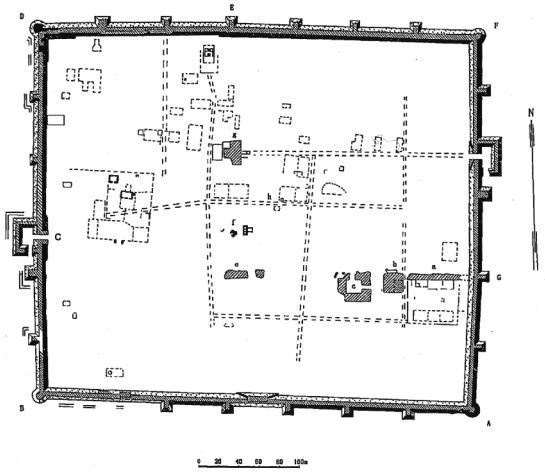


圖 38：哈喇浩特遺址平面圖
瑞典弗克・貝格曼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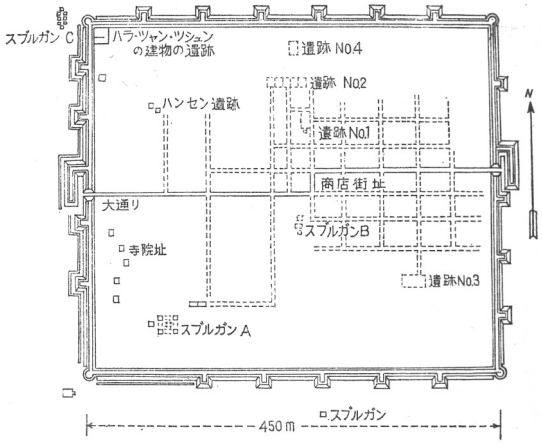


圖 39：哈喇浩特遺址平面圖
俄國科茲洛夫繪

設若結合俄國科茲洛夫隊、斯坦因隊以及現藏瑞典斯德哥爾摩民族學博物館等獲自哈喇浩特城遺址所採集、發掘的陶瓷標本，可知其中的景德鎮元代青花瓷除了有壺、瓶、器臺等立件之外，以碗、盤、缽等器形最爲常見，[13] 而爲數不少的玉壺春瓶、匜和高足杯則是元代流行的飲酒道具，此一器類特徵與輸往中東地區的青花種類形成對比，[14] 另一應予留意的是，目前未見繪飾人物的標本。[15] 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元代龍泉窯青瓷標本件數較少，器形限於碗、盤和高足杯（1 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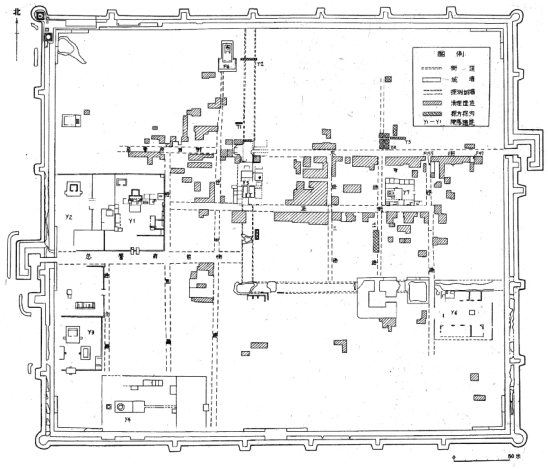


圖 40：哈喇浩特遺址平面圖
中國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繪

學界對於哈喇浩特出土陶瓷的調查結果已經表明，標本的種類包括了西夏時期（1038-1227）黑釉剔劃花和宋金時期耀州窯青瓷、定窯白瓷等製品，以及元代龍泉窯、景德鎮窯、鈞窯等南北瓷窯標本。[16]《元史・地理志》載「亦集乃路，下。在甘州北一千五百里，城東北有大澤，西北俱接沙磧，乃漢之西海郡居延故城，夏國嘗立威福軍。元太祖二十一年（1226）內附。至元二十三年（1286）立總管府」。以往出土文書早已證實哈喇浩特城並非漢代居延城，而是西夏黑水城，也就是亦集乃路故城，意思是說西夏黑水鎮燕軍司城被

[13] 弓場紀知，〈エルミタージュ美術館所藏のコズロフコレクション—カラ・ホト城出土の中国陶磁器を中心に—〉，頁 130-131。
[14] 謝明良，〈元代青花瓷備忘錄〉，收入《陶瓷手記 2》（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頁 247。
[15] 李仲謀，〈談黑水城遺址發現的元代青花瓷器〉，頁 566。
[16] 弓場紀知，〈エルミタージュ美術館所藏のコズロフコレクション—カラ・ホト城出土の中国陶磁器を中心に—〉，頁 109-156。

成吉思汗攻陷（1226），到了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在此設亦集乃路總督府，而目前哈喇浩特出土文書中，年號最晚的爲北元宣光元年（1371），所見遺物則是一方北元天元元年（1378）鑄造的八思巴文官印，因此學界一般認爲《明實錄》載明代洪武五年（1372）馮勝軍西征亦集乃路虜捕蒙古守將一事之後，仍有居民在此活動營生。[17] 不過，本文以上所介紹的標本當中，除了標本 7（同圖 16）較難確定之外，其餘均屬元代製品。

從以往學者對於哈喇浩特遺址所獲陶瓷標本的調查結果看來，遺址中的景德鎮青花瓷或龍泉窯青瓷等南方瓷窯器類大致上和中國國內其他省區出土作品相近，因此可以同意其有可能是當地居民使用的遺留。與此同時，從遺址性質和地理位置又可推測部分陶瓷也做爲商品輸往中亞，如岡崎敬就依據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盆地高昌古城發現的龍泉窯青瓷缽，以及霍城縣北屬察合台汗國（Chagatai Khanate）的阿力麻里古城（Almalik）的元青花瓷，認爲這些陶瓷可能是由元大都（北京），經包頭至哈喇浩特而運送來的。[18] 弓場紀知也指出中國陶瓷常以內蒙集寧路、燕家梁爲集散都市，再運往哈喇浩特和哈喇和林（Kharkhorum），而後再轉往更西方的阿力麻里古城，甚至遠至今蒙古共和國 Avraga 遺址。[19] 今蒙古國前杭愛省的哈喇和林遺址是建設於戈壁砂漠綠洲的大型城寨都市，設和林宣慰司是蒙古帝國政商和軍事的重要據點之一，而哈喇浩特正是通往哈喇和林，以及連結哈喇和林和河西走廊的樞紐。就陶瓷標本所見而言，哈喇和林出土大量標本的種類組合和哈喇浩特所見頗爲相近，[20] 而運往哈喇和林的主要驛道有所謂的帖里干道、木隣道，和自甘州經哈喇浩特亦即自戈壁砂漠北上至哈喇和林的南北路，以及以哈喇浩特爲交點的東西路。[21] 十三世紀後期威尼斯的旅行家馬可波羅（Marco Polo）在其行紀中就提到從甘州（今張掖）騎行十六日「可抵一城，名曰亦集乃」，也就是哈喇浩特即黑城，自此再行四十日就可到哈喇和林。

文末，我們有必要回頭省思前揭圖 9、11、13、21、28、33、35 所見圓形鑽孔，因其不僅涉及到歷史上陶瓷鋦補這一技藝，也和此類陶瓷的消費場域息息相關。從目前的資料看來，中國區域在業已破裂的高溫炻器兩側鑽孔，並於鑽孔植入兩端屈曲形似釘書針的「ㄇ」形金屬釘，予以接合修復的鋦釘補瓷技藝，最早可見於甘肅武威唐弘化公主墓出土的白釉帶流壺，[22] 內蒙古博物館藏呼和浩特和林格爾縣出土的北宋末至金代的河北省定窯大缽則在缽身植入七只鐵釘（圖 41），[23] 而包頭市燕家梁發現的

[17]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郭治中等），〈內蒙古黑城考古發掘紀要〉，頁 23。

[18] 岡崎敬，〈西夏カラホト古城と元青花について〉，頁 274。

[19] 弓場紀知，〈カラホト城は交易都市か——内モンゴル自治區の金・元時代の遺跡出土の中國陶磁器から〉，《オアシス地域史論叢——黒河流域 2000 年の點描》（京都：松香堂，2007），頁 165。

[20] 龜井明德編，《カラコルム遺跡出土陶瓷器 I》（川崎：專修大學文學部，2007）；龜井明德編，《カラコルム遺跡出土陶瓷器 II》（川崎：專修大學文學部，2009）。

[21] 龜井明德，〈中國出土元青花瓷の研究〉，《亞州古陶瓷研究》IV（2009）：52。

[22] 甘肅省博物館編，《甘肅省博物館文物精品圖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頁 247。

[23] 龜井明德，〈カラコルム出土陶瓷器穿孔の意味〉，收入天野哲也等編，《中世東アジアの周緣世界》（東京：同成社，2009），頁 177-178。

元代青花蓮池鴛鴦碗甚至在口沿裂璺外襯銅片並於銅片植入深及瓷胎的銅鋦釘（圖42）。[24]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標本（圖 9、11、13、21、28、33、35）所見小鑽孔顯然就是補修陶瓷時留下的孔洞。不同的是，前引河北省定窯缽和包頭市青花蓮池鴛鴦碗的鋦孔孔徑既小且不穿透器壁，若施加銅釘盛水後亦無滲水之虞，但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哈喇浩特青花和龍泉窯標本，鑽孔口徑相對較大，且不乏穿透器壁者，此一工法相對粗製，但其既可施加粗徑的透壁釘釦，也可在鑽孔中穿以細繩、皮條或金屬線等來予緊縛固定，類此之陶瓷補修技藝除了中國地區之外，阿曼半島西海岸哈伊馬角（Ras Al-Khaimah）朱爾法（Julfar）遺址出土的一件十四世紀伊斯蘭釉陶標本（圖 43），[25]即是在待修補的陶瓷兩端鑽孔，再以金屬絲穿入孔洞緊繫接合。另可一提的是，標本4（同圖 9）元代青花玉壺春瓶頸部殘件，其口沿以下繪蕉葉部位有穿透式鑽孔，但下方變形蓮瓣處的鑽孔則未穿透（同圖 9b），鑽孔多由外向內鐫，但近口沿部位亦見一處由內壁向外鐫之例，此既反映了施作工匠的補修鑽孔技藝，也顯示鑽孔是否穿透可能還與匠人的專業水準有關，因稍不留意就會造成貫穿的孔洞。不過，若就集寧路古城遺址採集到的元代龍泉窯蓮瓣碗碗壁殘片的穿透鑽孔而言，其內外壁孔均上廣下窄，顯然是分別從內外兩側鑿孔施作而成的（圖 44），因此鑿孔施作方向也有多種考慮，不宜一概而論。

宋元時期此類留下鋦孔的陶瓷標本經常可見，如哈喇和林城遺址或蒙古國前杭愛省「陶瓷城」（Shaazan-Khot）就見不少補修時留下的穿孔標本，[26]內蒙托克托縣徵集的帶有近三十枚鐵鋦釘的元代青花盤更是著名的實例（圖 45）。[27]後者一說認爲是在元大都鋦補後再販售至托克托縣的商品，[28]然而我們更應留意哈喇和林所見帶鑽孔的陶瓷其實包括不少檔次較低的北方磁州窯類型製品；[29]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同爲哈喇浩特遺址採集的鈞窯製品（典藏號 H14410）亦爲一例，哈喇和林標本中甚至還可見到在當地所燒製無釉粗質瓮缸等炻器施加鋦補之例。因此，本文同意龜井明德主張負責補修的匠人應是當地作坊工匠的說法，[30]本文在此想強調指出的是，此一現象正意謂經鋦補或穿繩緊縛修繕的陶瓷極可能就是當地的消費品。[31]

[24]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著，《包頭燕家梁遺址發掘報告》下（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彩版158。

[25] 佐佐木達夫等，〈發掘資料解釋と景觀復元によるジュルファルの都市的性格檢證〉，《オリエント》48.1（2005）：45。謝明良，《陶瓷修補術的文化史》（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8），頁 85-86。

[26]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陳永志等），〈蒙古國前杭愛省瓷器城遺址的調查及相關問題探討〉，《草原文物》2013.1：20。

[27] Adam Kessler, *Empires Beyond the Great Wall* (Los Angeles: Natural History Museum of Los Angeles County, 1993), p. 139；另外，該青花瓷盤外盤底鍋釘圖片可參見 John Carswell, "Kharakhoto and Recent Research in Inner Mongolia," *Oriental Art* 45.4 (1999-2000): 25, pl. 14.

[28] 弓場紀知，〈鋲で補修された元青花盤—内モンゴルから出土した元青花盤—〉，《陶說》671（2009）：38-44。

[29] C. B. 吉謝列夫等，孫危譯，《古代蒙古城市》（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頁 187, 191-192；圖版 81 之1、彩版壹壹之一。

[30] 龜井明德編，《カラコルム遺跡出土陶瓷器 II》，頁 98-99。

[31] 中國歷史上鍋釘補瓷技藝，可參見：謝明良，《陶瓷修補術的文化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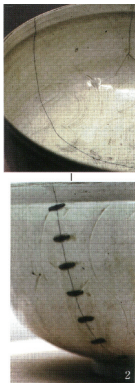


圖 41：定窯白瓷缽，D 約 30cm
中國內蒙呼和浩特和林格爾出土



圖 42a：中國包頭市燕家梁出土元青花碗，內面



圖 42b：同上，側面



圖 43：朱爾法遺址出土十四世紀伊斯蘭釉陶標本



圖 44a：元代龍泉窯蓮瓣碗碗壁殘片圖



圖 44b：同上，內面



圖 45a：中國內蒙托克托縣徵集的元青花折沿盤
D 40cm



圖 45b：同上，底部

從以往學者對於哈喇浩特遺址的調查發掘成果及所獲文書可知，元代亦集乃路不僅居住漢人，也有許多穆斯林，並建有清眞寺。哈喇浩特文書所見穆斯林的職業包括官吏和商人，科茲洛夫發現的波斯文殘碑和漢文、阿拉伯文文書等資料，也顯示亦集乃路穆斯林主要使用波斯文、阿拉伯文，其次才是漢文。[32] 因此，儘管已知的於高溫炻器鑽孔鋦補的案例目前以中國區域的年代最早，但元代哈喇浩特居民及其和穆斯林的深厚淵源，很自然地會讓人聯想到在高溫炻器鋦孔補修或在瓷器加裝金屬配件一事，恰好正是中近東地區伊朗、土耳其等地工匠擅長的技藝。就此而言，哈喇浩特遺址採集的帶鋦孔標本或許就是出自當地的穆斯林工匠之手。

另一方面，包括哈喇浩特在內的蒙元遺址，如哈喇和林、敖倫蘇木都發現了大量的青花瓷，而斯坦因在哈喇浩特所獲文書（1914 年，F111：W33）載「……買回回青……」則是有關青花瓷器青料來源的重要記事。[33] 藥學博士中尾萬三曾撰文考論中國陶瓷青花原料，既援引明崇禎年間宋應星《天工開物》說「回青，乃西域大青，美者亦名佛頭青」，也檢討了《格物鏡源》引用帶有南宋紹興癸丑（1133）題記的杜綰《雲林石譜》所提到「石青惟滇中者佳，貨石青者有天青、大青、西夷回回青、佛頭青，而回回青尤貴」的內容所指。[34] 博學的楊聯陞教授果然也注意到中國陶瓷青料問題，不僅評論了中尾博士的著作，更提示一則極爲難得的記事，此即出版於明萬曆十五年（1587）由周夢暘等撰寫的《水部備考》（日本內閣文庫藏）。該書〈收放回青〉一節提到「回回青」也稱「蘇嚕呢石青」，產於爪哇國和撒馬爾罕等地，並提及吐魯番進貢回青，而由朝廷支付每斤銀二兩。[35]

如前所述，爪哇國都城門遮把逸山宮殿遺址範圍 Trowulan 曾採集到大量的元代和明初景德鎮青花瓷標本，而在今烏茲別克的撒馬爾罕郊外都城阿夫拉西亞伯（Afrasiyab）是伊斯蘭陶器（九至十世紀）的生產地，也曾出十五世紀前期永樂朝青花。[36] 不僅《明實錄》成祖對撒馬爾罕等多有賞賜（〈太宗實錄〉），《明史》也提到「磁器市之失剌思及撒馬爾罕諸國」（〈列傳〉第二百二十，〈西域傳〉四）。[37] 目前雖未接獲撒馬爾罕出土元代青花瓷的報導，但其既曾是花剌子模帝國的都城，十三世紀初被成吉思汗攻陷之後，又屬帖木兒王朝（1370-1507）領地。這也就是說，爪哇國和撒馬爾罕不僅經手青花瓷所需原料「回回青」，其自身也是青花瓷的消費者，此或與伊斯蘭教徒或蒙古人對於青色的喜愛有關，而這一情況也反映在哈喇浩特遺址出土的元青花標本。

[32] 陳瑋，〈元代亦集乃路伊斯蘭社會探析——以黑城出土文書、文物爲中心〉，《西域研究》2010.1：12。

[33] 此轉引自陳瑋，〈元代亦集乃路城伊斯蘭社會探析〉，頁 12。

[34] 中尾萬三，〈支那陶磁の青料考〉，收入《陶器講座》第 9 卷（東京：雄山閣，1936），頁 1-81。

[35] 楊聯陞，〈約翰・亞歷山大・波普，《阿德比爾寺藏中國瓷器》〉，原文爲英文，載於《亞洲哈佛學報》21（1958），本文據蔣力編，《漢學書評》（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頁 371-372。

[36] 杉村棟等，〈中央アジアの遺跡と陶磁器〉，《シルクロード學研究》7（1999）：18，圖 15。

[37] 閻焰，〈從「帖木爾」時代出現在撒馬爾罕附近的永樂青花看當地的窯事〉，收入《明代生活美學論壇文集》（臺北：中華文物學會，2019），頁 238-253。該文也報導了塔什干以南吉扎克出土的永樂朝青花大扁壺殘件，並且指出永樂朝與河中地區的頻繁交往，透露出元代景德鎮青花瓷有一部分是通過河西走廊或蒙古草原杭愛山北線南下經河中地區過伊朗高原西行的。

圖版出處

圖 1：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圖 2：專修大学アジア考古学チーム編，《インドネシア・トローラン遺跡発見陶瓷の研究—シンガポール大学東南アジア研究室保管資料—》（川崎：專修大学アジア考古学チーム，2010），頁 262，插圖 2。

圖 3：專修大学アジア考古学チーム編，《インドネシア・トローラン遺跡発見陶瓷の研究—シンガポール大学東南アジア研究室保管資料—》，頁 262，插圖 1。

圖 4：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圖 5：上海博物館編，《幽藍神采：元代青花瓷器特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2），頁 148-149，圖 44。

圖 6：出光美術館編集，《出光美術館藏品圖錄：中國陶磁》（東京：出光美術館，1987），圖 141。

圖 7：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圖 8：專修大学アジア考古学チーム編，《インドネシア・トローラン遺跡発見陶瓷の研究—シンガポール大学東南アジア研究室保管資料—》，頁 74，圖 23 之 1。

圖 9：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圖 10：出光美術館編集，《出光美術館藏品圖錄：中國陶磁》，圖 146。

圖 11：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圖 12：安徽省博物館編，《元瓷之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頁 42。

圖 13：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圖 14：Larry Gotuaco et al., *Chinese and Vietnamese Blue and White Wares Found in the Philippines* (Makati City, Philippines: Bookmark, 1997), p. 70, pl. 35a.

圖 15：專修大学アジア考古学チーム編，《インドネシア・トローラン遺跡発見陶瓷の研究—シンガポール大学東南アジア研究室保管資料—》，頁 250，圖 2 之 08-1~08-7、09-3。

圖 16：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圖 17：Regina Krahl et al.,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Topkapi Saray Museum Istanbul: A Complete Catalogue*, vol. II, Yuan and Ming Dynasty Porcelains (London: Sotheby's Publications, 1986), pp. 394-395, pl. 576.

圖 18：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圖 19：安徽省博物館編，《元瓷之珍》，頁 55。

圖 20：博・索馬斯特勒姆（Bo Sommarström）著，黃曉宏等譯，《內蒙古額濟納河流域考古報告：〔瑞典〕斯文・赫定博士率領的中瑞聯合科學考查團中國西北諸省科學考查報告考古類第 8 和第 9》（北京：學苑出版社，2014），頁 472，圖版 28 之 17a。

圖 21：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圖 22：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景德鎮出土陶瓷》（香港：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1992），圖 124。

圖 23：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圖 24：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景德鎮出土陶瓷》，圖 129。

圖 25：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圖 26：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圖 27：安徽省博物館編，《元瓷之珍》，頁 127。

圖 28：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圖 29：文化財廳、國立海洋遺物展示館，《新安船 The Shinan Wreck》II（木浦：國立海洋遺物展示館，2006），頁 75，圖 68。

圖 30：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圖 31：文化財廳、國立海洋遺物展示館，《新安船 The Shinan Wreck》II，頁 113，圖 106。

圖 3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龍泉大窯楓洞岩窯址》下（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頁 623，圖 4073。

圖 33：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圖 34：文化財廳、國立海洋遺物展示館，《新安船 The Shinan Wreck》II，頁 85，圖 78。

圖 35：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圖 36：劉金成編著，《高安元代窖藏瓷器》（北京：朝華出版社，2006），頁 97。

圖 37：《邊疆考古研究》第 7 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頁 354，圖 1。

圖 38：博・索馬斯特勒姆（Bo Sommarström）著，黃曉宏等譯，《內蒙古額濟納河流域考古報告》，頁 199，圖 84。

圖 39：弓場紀知，〈エルミタージュ美術館所藏のコズロフコレクション―カラ・ホト城出土の中国陶磁器を中心に―〉，《京都橘女子大學研究紀要》31（2005）：113，插圖 2。

圖 40：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郭治中等），〈內蒙古黑城考古發掘紀要〉，《文物》1987.7：2，圖 1。

圖 41：龜井明德編，《カラコルム遺跡出土陶瓷器 II》（川崎：專修大學文學部，2009），頁 99，圖 24。

圖 42：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著，《包頭燕家梁遺址發掘報告》下（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彩版 158。

圖 43：謝明良，《陶瓷修補術的文化史》（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8），頁 85，圖 65。

圖 44：元代龍泉窯蓮瓣碗碗壁殘片，集寧路古城址採集，小林仁拍攝提供。

圖 45：Adam Kessler, *Empires Beyond the Great Wall* (Los Angeles: Natural History Museum of Los Angeles County, 1993), p. 139; John Carswell, “Kharakhoto and Recent Research in Inner Mongolia,” *Oriental Art* 45.4 (1999-2000): 25, pl. 14.